

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
• 纪念齐格蒙特·鲍曼专题 •

齐格蒙特·鲍曼的遗产

[澳]彼得·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

郑莉李天朗译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齐格蒙特·鲍曼的离世引发了众多的讣告和回应,一些充满敬意,一些充满困惑,另一些则充满嫉妒。社会学界似乎要在两类人之间划清界限:一类是希望通过宣传鲍曼来使自己出名或受到社交媒体关注的人,一类是将鲍曼推到一边的那些知名人士、记者甚至江湖骗子。通过评估鲍曼的思想遗产,可以解释这种困惑。事实上,鲍曼的作品有一种逻辑或模式,他根据流动的现代性的总体理论,有针对性地对爱、个体化、工作和难民等时代性表征加以分析。

[关键词]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症候学;批判的社会学;时代的表征

[中图分类号]C91-0;K835.13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6-0034-04

2017年1月10日,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辞世,享年91岁。他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你可到谷歌上搜一下,或是翻翻政治(Polity)出版社的书目了解一下。

他说了些什么?他的遗产是什么?

我们身边有些引人发笑的鬼话。有谣言称鲍曼剽窃,甚至更好笑,说他自我剽窃(你若有些有意思的东西要说,重复你自己并非一个坏主意)。有人暗指鲍曼作为共产党员做过可耻的事,可他们仅有的那些证据都显得毫无根据。更常见的说法是鲍曼的见解萦绕着悲观主义。在这个无止境进步的时代,上天会原谅这位波兰社会学家带着坏消息往生极乐。在由半岛电视台制作的鲍曼生前最后一次访谈中,他重申自己是一个将长期的乐观主义与短期的悲观主义结合起来的人。甚至当我们求助于葛兰西的智识上的悲观主义和意志上的乐观主义的表述时,涉及的术语也不是很有用。悲观主义是一种态度,或是一种性情;社会学的实践则更依赖于对话、辩论、理论、论点和论证,以及品评和批判。实际上鲍曼是人类学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人类总是能过得更好。但他也遵从阐释学的想象,这使我们力图扮演信使的角色;没人欢迎来访者,正如当今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欢迎陌生人的想法。

但为什么说鲍曼像个幽灵(bogey)?为什么他会给人一种性情乖戾的老人的形象?他是世界末日

[收稿日期]2017-05-24

[作者简介]彼得·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 1953-)男,澳大利亚人,西澳大利亚州(WA)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社会与文化“研究教授”(Research Professor),曾任拉筹伯(La Trobe)大学教授和“提纲十一”(Thesis Eleven)文化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与齐格蒙特·鲍曼私交逾25年,已有六部书和大量文章研究鲍曼。本文系为澳大利亚《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Sociology)所写新作,英文题为The Legacy of Zygmunt Bauman,兹经作者授权译发。

[译者简介]郑莉(197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理论与文化社会学研究。

的先知吗?他确实饱经沧桑,但我们更愿说他是睿智通达。每一个与鲍曼接触或是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会告诉你一些关于他的慷慨、好奇、承诺与探究的故事。即便他越来越将“流动的现代性”挂在嘴边,他依然是一个引人注目、具有开放个性的人。

鲍曼声名卓著,却“不修边幅”。他并不情愿做名人,他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他是一个移动的靶子,或者说他喜欢对移动着的靶子——诸如爱、忠诚、现代性、认同、难民、陌生人、不平等、全球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媒体、消费、文学、个体化、电视、手机、身体的强化、死亡、社交媒体——提问题。或许这能解释鲍曼为何既有那么多钦佩他的阅听人,又招致那么多业内同行的厌恶。他有一种连接的能力;他既关注关乎全局的议题,又能讲述人们身边的小事。在盎格鲁的意义上,他不是专业的社会学家,而是一个受人欢迎的知识分子,他对划定学科边界不太感兴趣。

在一个社会学实践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专门化的世界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各设壁垒,并且需要去讨好我们的雇主和业内专家,但鲍曼是一个另类。在这一点上,即使对他钦佩不已的那些人也难以理解。一些人只是看不起他,就像英国那些资深的社会学家,他们显然认为,鲍曼只是刚好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他们认为,鲍曼不利于社会学的事业,也不利于社会学的专业。还有一些人,像尼尔·格罗斯(Neil Gross),他在2017年2月9日的《纽约书评》中写道:鲍曼的思想杂乱无章,缺乏条理。在我看来,杂乱无章对于社会学家而言倒是一个好的归宿。当然,这也是让任何社会学疯狂的办法。实际上,正如我要在此阐明的,鲍曼的思想轨迹有一条清晰的路径。初看之下或许不容易从其大约58部英文著作中发现这条散碎的线索,但它确实存在。

所以,让我们从他最初的英文著作开始——不,还是让我们从更早的地方开始,看一看他在波兰的早期生活。那是一个早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鲍曼社会学的资料就是经验的资料,他经历了20世纪的纳粹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三股主要的世界力量,经历了帝国统治和种族控制。作为一位犹太共产党员,一个两次经历体制性排犹太主义的受害者,他的人生从波兰军队到了华沙大学,正是在那里,他发现了社会学。那是一种欧陆式的社会学,或者用他后来的话说,是一种批判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假定那些最有意思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哲学问题中。这种社会学还需要一个警示性说明,即与国家和统计学做的工作保持距离。但要记住,他从未放弃社会学的承诺,他终生捍卫这一事业。

在接触了一些美国和英国学者之后,以及在波兰经历了批判的、或曰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之后,鲍曼与科拉科夫斯基(Kołakowski)等重要的教授一起因“腐蚀青年”而被解职。他们除了流亡别无选择。鲍曼一家拿到了出境签证,辗转于特拉维夫和堪培拉,最终定居于利兹。在这一时期,鲍曼以一部出版于1972年的讨论英国劳工运动的著作^[1]开启了他的英文叙事。他的写作步入了快车道,但直到他1990年退休后,其著作才呈现了喷涌之势。

在上述关于英国劳工运动的著作之后出版的一系列著作没有明显的连续性:有的涉及文化和社会主义,这是他早期的两个主题;之后是批判社会学、阐释学和阶级的观念;1987年后,人们认为鲍曼经历了一个后现代转向。鲍曼确实是最早严肃地讨论后现代的社会学家之一,但如他所说,后现代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而非解释现状的优先路径。后现代需要认真对待,因为它似乎表征了重要的社会性(societal)变化,或者说至少知识分子认为那些变化就发生在我们身上。鲍曼在1989年出版了《现代性与大屠杀》^[2],现在看,此书的出版真是石破天惊。它最初引来了满含敌意的回应,如今则成为一个标准的参考文献。换言之,对现代性的批判已经变得稀松平常,因为像鲍曼这样的批评家们已经着手去研究其阴暗面。该书不仅力图阐明大屠杀,更力图阐明它所必备的现代前提;他的第一任妻子贾尼娜·鲍曼(Janina Bauman)则在她令人震惊的回忆录《晨冬》^[3]中为他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女性拼贴”(femmage,原指米拉姆·夏皮罗[Miriam Schapiro]首创的一种女权主义艺术形式,以布料、化妆品等与女性家庭活动有关的物品为材料——译者注)。这也开启了他对伦理学的进一步兴趣,如他所说,关于大屠杀的最令人胆寒的想法是:这并不只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东西,而且我也可能成为凶手。

更多的著作随之而来,《现代性与矛盾性》^[4]是其中最具智识的一部。这些著作讨论了道德、伦理学、碎片中的生活、自由,更多的是关于后现代与全球化,工作、贫困与新穷人,观光者与流浪者,政治的终结等主题的。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更广泛的惊人的变化。鲍曼至此已经退休了,他改变了自己的写作策略。他决心不再为了我们、为了他在全球的同行而写作了,这类读者或许大体上都被期待亦步亦趋地跟进重要思想家的理论工作。鲍曼转而开始为一种想象中的客户写作,他们可能是那些爱读奇怪书籍的人,可能是那些坐在伦敦地铁和公交上的人,可能是那些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打盹看书,却游逛于商场、网络和别人货架的人。最不同寻常的著作还要数2003年出版的《流动的爱》(Liquid Love),尽管真正的转折点它是它的前篇,即2000年的《流动的现代社会》(Liquid Modernity)^[5]。

什么是流动的现代?在新千年的节点上,对后现代论争的激情已经逐渐衰退。可能是对后现代的推测过于热情了,回想起来,是对于徒有其表的“全球”的热情,以及太过于依赖对新自由主义的运用,而后者还没有到来。像鲍曼的其他著作一样,《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的观点是多重的。它声称我们对彼此、重要的他人、我们的制度和忠诚的看待方式都发生了重要的文化转向。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与战后的、福特主义的固态西方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对于雇员和恋人而言,人类彼此间一次性使用的原则跟外卖咖啡杯和塑料寿司包装一样。人类没有被直接倒入垃圾场,但人们的生活似乎直接被废弃了。其他地方的人则正在分拣我们西方世界的垃圾。冗余、浪费和过剩包围着我们。

《流动的现代社会》就是鲍曼的一部过渡性作品,如果不是在内容上,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由于鲍曼从这时开始决定聚焦于想象中的普罗大众,而不是学术界的阅听人,因而那些貌似企鹅(Penguins)、苏尔坎普(Suhrkamp)、“10/18’s”出版社图书风格的小巧著作得以流淌而出。鲍曼的叙述范围从此铺展开来,遍及了监视、管理、教育和文学等形形色色的领域。他的写作风格变得更具对话性,《来自液态现代世界中的44封信》(44 Letters From the Liquid Modern World)或是《此非日记》(This Is Not a Diary)都是如此,当然,后者的书名是在用马格利特的名画《这不是一支烟斗》来调侃,实际上该书确实是一本日记,它讲述了那个恢宏又可怕的时代。

《流动的现代社会》勾勒了所有议题,或至少打开了这一视界。就此而言,鲍曼的工作完全是有条不紊的。匆匆扫过流动性的观念和隐喻后,该书接下来的章节探讨了解放、个体性、时间/空间、工作和共同体,并附了一篇关于写作和写作社会学面临挑战的后记。鲍曼总是坚持将此职业看作社会学。

在此之后,一批小巧的著作奔涌而出。这些主题涉及废弃和废弃的生活、人口过剩、生活的艺术、流动的时代、恐惧和流动的恐惧。讨论这么多议题,或许会令鲍曼的工作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关键在于鲍曼在此采取了一种症候学(symptomatology)的策略。每一本小书都是与一个中心的对话,都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们都是对流动的现代生活的不同方面的审视,而总的诊断已经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勾勒出来了。因为每一部小书都论及了大议题的一个症状,诸如共同体、身份认同、全球化、爱,等等,所以大议题得以延续下来。战后西方虚假的自我确定性如今在我们眼前蒸发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这种境况发生在战后的繁荣和给予了我们一切的现代化机制之后,它们没能完成许下的诺言。结果,正如《怀旧的乌托邦》^[6]所论述的那样,我们转而要人事皆非之前大发怀乡之情,梦寐以求某种据说是更为单纯的世界。因而就有了特朗普、英国脱欧和全新的观念。我们确实无法回到过去了,唯其如此,我们封住大门,构筑壁垒,上屋抽梯。因为我们,或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曾经有资格体面地活着,现在却变得灰头土脸;或者,因为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分享我们西方的好运了。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对于鲍曼而言,这种恐惧就叫流动的恐惧。

即使承认鲍曼不是一个怪老头,也得说他是一个日薄西山的理论家?与其说这是针对鲍曼而提出的问题,倒不如说这是我们的问题。鲍曼的“瓶中信”确实是以警示故事的形式传递出来的。他以一种摒弃了幻想的现代性方式讲述着后现代,也常常要用“去熟悉化”的方式讲述那些熟悉的事情。像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鲍曼期待着一个更加公平和正义的世界,但是,他意识到了那种令我们不堪重负的恐惧,我们恐惧于失去我们现在所享有或曾经享有的特权,于是我们设法用政治安顿生活,使得我们能够更容易地躲进小楼,锁紧房门,收走上楼的梯子。虽然在现存的政治系统中不再有重要的替代选择,但是我们已经牢牢锁住,就像被锁在别的什么铁笼中一样。这是集体性的问题,甚至,在我们想出可能的解决办法之前,需要共同的讨论。但是我们总能做得更好。

再说说我,说说我们——他和我吧。我大约在1988年认识了鲍曼。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社会学

杂志》(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Sociology]的前身)上,我评论了他那本不可思议的《立法者与阐释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我把复印件寄往他在劳恩斯伍德花园(Lawnswood Gardens)的家,估计这篇小文不会以其他方式出现在他面前。我们《提纲十一》(Thesis Eleven,贝尔哈兹曾长期担任该刊编辑——译者注)那时已经发表过他的文章,后来的几十年也一直刊发其文章。从此,我每年都顺道拜访住在利兹的鲍曼,如此一年一度的拜访持续了二十多年。刚进入90年代时,出版鲍曼著作的出版社并不多,他也尚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此前鲍曼尚未退休,也还没有开始写作那些小书,他那时强于论述,善用脚注,至少是很爱引用像马克思或韦伯那样的经典人物。在2000年,我出版了第一部论述鲍曼的著作《现代性的辩证法》^[7],《鲍曼读本》^[8]也于同年出版。这就是说我在所谓“流动的现代”转向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鲍曼了。此后,我又于2002年出版了四卷本的批判性评论文集《齐格蒙特·鲍曼:批判思想的大师》^[9]。从那时到现在,我已经发表了二十来篇研究鲍曼著作的论文,因为我从未失去对鲍曼思想的兴趣。

对我来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这种好奇心持续下来:一是不断变换目标,他总是有新的问题或议题去追索,一直到他2017年的最后一部著作《怀旧的乌托邦》。二是,鲍曼总是与许多对话者保持对话,以至于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我发现了大多数令人感兴趣的思想家:从桑内特(Sennett)、齐美尔(Simmel)到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德里达(Derrida)、福柯(Foucault)和泽巴尔德(Sebald)、赫勒(Heller)和阿伦特(Arendt)、哈贝马斯(Habermas)和布迪厄(Bourdieu)、罗蒂(Rorty)和穆齐尔(Musil)、萧沅(Cioran)和列维纳斯(Levinas),等等,所有这些人都在此出现。鲍曼经常喜欢说,他的家里有很多房间。可他也确实是在一个朴实无华、与世隔绝的家中走过了堪称楷模的一生,他那里藏书如山,从不缺少美酒和好客之情。以这诸多重要学者为参照点,并非意在攀附名人来抬高身价,而是一种民主的共识,即关于我们当下的议题,总是存在一些人故事可讲,我们总会进入一个现存的、多元的话语场域,而迷恋于凭空创新则是最不可取的学术自负。总是存在着一种先于我们的对话。我们声音不大,我们广泛对话。

鲍曼的对话者还越来越多地转向了文学界,如卡尔维诺(Calvino)、佩雷克(Perec)、奥威尔(Orwell)与赫胥黎(Huxley)、萨拉马戈(Saramago)、博尔赫斯(Borges)、卡夫卡(Kafka)、昆德拉(Kundera)以及东欧的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这里的关键在于,鲍曼不再迷恋个人的原创性了。他造就了一个有着多种声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式各样的作家为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考不同可能性的巨大宝库。所以他晚期的著作之一就叫《赞美文学》(In Praise of Literature)。这种做法能否令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里直率地要求“先生,事实就是事实!”的格雷因(Gradgrind)先生满意呢?当我们铭记鲍曼时,我们要记住,格雷因也是个文学形象,而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名言“一切固定的东西……”这一意象则似乎其实源自莎士比亚。这些意象或许都已成为“流动”的,但鲍曼的遗产却更为坚实,更具批判性,而且最终更有希望。这份遗产也指出了需要坚守某一立场,以及需要在这个恢宏又可怕的世界里为我们自身指明方向。鲍曼的遗产有助于我们找到方向感。地图、罗盘、铅笔……鲍曼(烟斗和火柴),一两本书。像所有伟大的知识分子一样,鲍曼并非一个布道者,而是一个率先垂范的榜样。

[参 考 文 献]

- [1] Bauman Z. Between Class and Elite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2.
- [2] Bauman Z.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M]. Oxford: Polity, 1989.
- [3] Bauman J. Winter in the Morning [M]. London: Virago, 1985.
- [4] Bauman Z.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M]. Oxford: Polity, 1991.
- [5] Bauman Z. Liquid Modernity [M]. Oxford: Polity, 2000.
- [6] Bauman Z. Retrotopia [M]. Oxford: Polity, 2017.
- [7] Beilharz P. Zygmunt Bauman — Dialectic of Modernity [M]. London: Sage, 2000.
- [8] Beilharz P. The Bauman Reader [M]. Oxford: Polity, 2000.
- [9] Beilharz P. Zygmunt Bauman — Master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M]. London: Sage, 2002.

(责任编辑:余明全 校对:孙琦)